

沙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军政轶事	●湘鄂西“清剿”亲历记	韩 流	1
	汉口红十字会荆沙救护记	李白贞	33
	沙市电信局职工反撤退的斗争	刘传意	40
	●荆沙沦陷前后	晓 岚	45
	光复沙市见闻	鲁 望	53
教育春秋	●朝阳学院在沙市	程幸超	56
	●国师迁置沙市的前前后后	朱翰昆	80
	日伪时期沙市的中等教育	杨文赋	89
	沙市的聘学	郑佳生	98
	●鄂南小学与雷鸣泽	张永大	105
	郑氏家族及通德私塾	郑昌淦	113
	我与沙市三育社小学	李东屏	118
报业旧闻	●我与《荆楚春秋》	刘兴林	121
	回忆《荆楚春秋》	沈涵陶	125
	沙市解放前的报纸概况	刘子云	129
体坛零拾	●沙市的民间体育与鄂西运动会	程幸超	142
工商史话	恒春茂的几位咸宁籍经理	方恒生	152
	●老东明绍酒酱园	宋勤高	158

本 辑	阮 隆 阳	李 祖 源	胡 吉 六	陈 先 健	刘 子 玉	王 贤 清	梁 上 贤	项 辛	李 开 进	张 永 大	崔 忠 培	魏 定 富	李 永 发	李 良 喜	刘 作 忠
审稿人员															

百 业 名 人	●为构筑艺术圣殿操劳的一生 ——忆吾夫余上沅	陈衡粹	165
	●汉剧的一代宗师余洪元	何鸣峰	178
	我所知道的雷啸岑	胡兴东	186
	●亡友陶尧阶	刘鸣皋	192
	C·C高干陶尧阶	李明馨	208
	近代沙市书画名家王哲华	夏艺圃	219
	先父李玉珂及其牙科诊所	李金凯	226
	漫忆童月江先生	李继唐	232
	●徐国瑞与荆江大堤的溃决	秦仲祥	239
市 政 沧 桑	●沙市市政之建设	徐源泉	246
	●家父王信伯与沙市市政建设	王文伟	271
	解放初期沙市的城市建设	李耀昆	281
沙 风 津 物	●沙市习俗史话	徐树楷	288
	●甲戌本石头记中有关沙市的俗语	漆忠珩	300
史 海 寻 踪	辛亥起义时的沙市	徐树楷	307
	●沙市海关述略	李开进	311
	●火烧“洋码头”	王正国	317
	沙市海关档案资料(摘抄)		326

梁上贤整理

湘鄂西“清剿”亲历记

韩 浚

南京电召 祸福难分

1933年，日寇占我东北广大地区后又向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地大举进犯。平津危在旦夕，形势极其严重。处于如此紧急关头，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只好作些象征性的防御姿态，命令徐庭瑤、孙连仲、商震等部到上述各口进行守备；又在南京成立所谓“北上抗日宣传总队”，大张旗鼓地向平津进发，以表示他决心抗日。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宣传队的人员几乎全是“蓝衣社”的社员，其总队长刘健群即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之一，由此可以概见其余。他还一再叮嘱要对杂牌部队将领的言论和行动严加注意，多接近中下级干部，特别注视平津的学

生运动，等等，而对抗日宣传却一字不提。我当时任宣传总队的大队长，到北平后，表面上遵循蒋的旨意，同各大学取得必要的联系。实际上却同意学生们对“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指责；同意师生们所提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应在民族仇恨的大前提下再次合作，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共同对敌的正确主张。可是数月之后，终因事机不密，这些情况被当时在北平陆军大学学习的黄埔一期同学夏楚中（抗战时曾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后病故）知道了，他密电蒋介石说：“韩浚借抗日宣传作掩护，搞异党活动，向北平各校宣传共产主义。”不到几天，我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我“即日来京”的急电。当时我想蒋素来疑心很重，且又手段凶狠，这一定是夏楚中的告密起了作用。去与不去，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那时，蒋介石权势赫赫，炙手可热，耽于名利者接到此电，可能受宠若惊，趋附之不遑，但我却疑虑丛生，惴惴不安。反复琢磨：象我这个与他久已不相往还，在其政治天秤上已经失掉重量的人，何况还有一段夙怨未了，急电来召，祸福殊难意料。从好想，可能有什么紧急任务，让我东山再起，派上用场；从坏想，要么受到控告，新帐、旧帐一齐算，找我去重重惩治一番。但又冷

静考虑：蒋介石就是要惩治我，打一个密电给北平宪警当局，抓我易如反掌，何必要我去见他。想来想去，百思不得一解。“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于是，头皮一硬，到了南京。

时间大概是1934年5月中旬，我到南京见到了蒋。几句套话之后，他说：“贺龙先前在洪湖很猖獗，现又进入山区，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清剿不可。”他顿了一下，又说：“现在派你到徐源泉（注：当时任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驻湖北沙市）那里当党政处长，要督促辖区专员、县长，切实组训民众，一切服从军事需要，不称职的一律撤换！”我听了蒋介石这番话，心想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党政军（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张群的政学系和黄埔军事系）三方面本来就不很和睦，要我来接这个差事，遵照他所说的去执行，不仅党政军所谓“三鼎足”的矛盾会更加尖锐，我也会因此得罪陈氏兄弟和张群，这些对我个人都是很不利，不能不产生顾虑。思索至此，立即回答：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与其将来干不好，有负校长重托，不如现在把情况说明，请校长另外考虑合适人选。”蒋介石连说“不好，这样不好！”“既然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先回北平准备一下吧！”我

再次请辞，他竟说：“我知道，你干得了的，有困难打电报给我。”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价钱好讲呢？！只好表示服从。我回北平稍事料理后，先到武汉，再转沙市。当时的沙市虽然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城镇，生意茂盛，市场兴旺，但房屋低矮，街道湫隘，显得不够气派。我也无心游览市容，随即登车到了童家花园（当时徐总部驻地，现沙市第三中学）。我与徐源泉见面时他格外高兴，叙了乡谊，还表示相见恨晚。不久，我以徐的名义召集辖区部分专、县负责人开会，传达了蒋的旨意，要大家遵照执行。但军政矛盾，颇难解决，所谓配合，不过纸上谈兵，敷衍应付而已。当时，我见湖北第七区（后改第四区，辖区与现在荆州专区基本相同）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雷啸岑自恃来头硬，不大买帐，乃与徐源泉密商，拟以“妨碍军政配合”之名将其扣押，刹刹他的嚣张气焰，并震慑一下其他几个不大听话的专员和县长。徐碍于“政学系”关系，投鼠忌器，怕弄僵了，不好收场，要我谨慎从事。我也因才接摊子，情况了解不够深入，扣雷一事，只好作罢。后来，雷啸岑与徐矛盾激化后，他曾向我说：当初要是照你的意思，把他扣了，省得今天的麻烦。从这以后，我与该总部

及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逐渐混熟了，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以下数人：副军长马登瀛、参谋长苗松培、杨绍东、师长张振汉、参谋处长黄道崇、副官处长贾云蒸、军法处长刘翔等。另外还有一营宪兵负责总部警卫，维持沙市治安。不久，徐率其总部开往鄂西，我和党政处留沙办公。那时，徐源泉因见沙市市政设施过于简陋，就在以先“沟渠委员会”基础上扩组市政建设促进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主任委员，沙市较有名望人士和商界大户多被延揽为委员。经过一番修建，市政建设确有相当成效，马路、公园、体育场均已粗具规模。实事求是，这点应当肯定。

“宝座动摇” 过河拆桥

留沙期间，我对蒋氏为什么要拼命“剿共”，为什么派徐源泉担任“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主将，为什么又派我当党政处长这几个问题，以及湘鄂西战场形势和徐总部之所作所为……又认真思索了一番，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电，参合自己平日之亲身活动经历和见闻，有了些感性认识。

这里先说蒋介石为什么要拼命“剿共”的问题。回溯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不畏牺牲，浴

血奋战，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蒋介石也因此声势大振，权倾一时。但他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先后击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冯玉祥、阎锡山等所统率的部队。在政治上，又挫败了“改组派”，踌躇满志，统治权欲极度膨胀，亟盼早日登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迅速发展，在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对其统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清除这种威胁，他决心实施“肃清匪共”与“召开国民会议”的两项重大措施。二者之中，又以前者最为重要。所以，“中原大战”刚告结束，立即掉转兵力，向江西的中央苏区和豫鄂皖边、湘鄂西等根据地大举进攻，以达到他清除障碍，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目的。

沙场点将 “冯妇”出山

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徐源泉这个杂牌将领，并派之为“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主将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时国民党正式任官上将的28人中，鄂籍将领仅有何成浚、徐源泉二人。这确实非比寻常，盖因蒋介石对湖北军人素无好感，听

说军政部保荐鄂人某某任师长，因蒋介石的红蓝铅笔一挥：“鄂籍将领，不可重用”，遂致告吹。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场合说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话来，引起鄂人反感。其实这只是历史传说。原来在封建时代，朝廷设置御史，以之作为谏议和耳目。除宰相外，御史成为朝廷的特殊人物，不必事先奏请，可以随时随地毫无阻挡地受到皇帝接见。

据说：明朝有九个御史，他们同奸臣沆瀣一气，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做尽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好人深受其害。因而百姓把九个御史叫做“九头鸟”。所谓九头鸟，是指天上一种最凶恶的鸟。它有十个头，后被受害者砍掉一个头，只剩下九个脑袋。鸟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成灾。

当时的宰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今沙市荆沙村）人，公正廉明，深受国人尊敬和称颂。他奏准皇帝把这九个御使削职为民，全国欢欣鼓舞。很多人高唱：“不怕天上九头鸟，只要地下一个湖北老。”（此老非佬）但被参掉的坏御史反而把这两句话当作对湖北人的讽刺。

蒋因鄂籍黄埔学生金亦吾、吴兴泗等少数人拆烂污而迁怒湖北人，却对何、徐二人特别垂青，微妙之处在于何成浚与蒋介石既有日本士官

学校同窗关系，又在蒋与政敌的历次斗争中，均曾得到何的支持，往往变被动为主动。蒋信任之下，屡授何以军中总参议、行营主任、军团长诸要职。加之，何系清末秀才，旧学甚有根底，尤擅笼络之术。声色犬狗、棋牌剧艺，既嗜且精。凡与之接触者，鲜不由衷倾倒。那些绿林出身的杂牌军人，几经周旋之后，自然乐于为之效力了。象这样的一个角色，作为蒋的政治砝码，其份量可想而知。

徐源泉早年投笔从戎，辛亥革命爆发时，参加了光复武汉的反清武装斗争。身先士卒，屡创清军，立下了战功。民国建立后，历任中下级军官，均以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见称。后来与张宗昌合股，先后投靠奉张、晋阎，也曾当过方面军司令、集团军司令等职，但总是战前拚命，战后被裁，一直蹉跎无成。何成浚看清了徐当时处境及其部队实力，因而在“中原大战”中许以金钱、禄位，拉徐投蒋。大战前，论军事实力，晋绥军及西北军联合起来，比蒋介石的中央军要强大得多。但蒋据有中央“正统”之尊，交通、地势之便，还得到江浙财团和英美国际势力之助，通过何成浚设在河南驻马店、漯河的“列车俱乐部”招待，晋绥军主要将领商震、西北军得力将

领石友三、韩复榘等先后倒戈，加上徐源泉归顺过来的十余万人（包括他收拢来的褚玉璞等残部），中央军实力骤增，优劣易势。在平汉路南段拉开战幕，几个回合过去，冯玉祥的西北军就被打垮了，徐源泉率部衔尾急追，一直把冯军赶到豫西才回师南京浦口。蒋介石夫妇亲往劳军，慰勉有加。徐也乘机“自矢忠诚”，取得了蒋的一定信任。其后，何始终是徐的顶头上峰，徐则因雄于资财，长期成为何的经济后盾，双方关系更为紧密。

再者，蒋介石虽在内战中获胜，但各路“诸侯”并不心悦诚服，再次爆发战争，随时可能。因此必须控制相当部队，以备不时之需，况且“围剿”中央苏区又动用了大量军事资本，再抽出嫡系部队到湘鄂西作战，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经何成浚之保荐，加上蒋介石鉴于徐部在中原大战中所表现之骁勇，遂决定由徐源泉担任鄂湘川边区“剿匪”清乡督办，赴湘鄂西与红军作战。

至于徐源泉又为什么将其“督办公署”设在沙市呢？在其对湖北重要城市选择方案中，也不难找到答案：“沙市位于长江北岸，有公路北通湖北之襄樊，南至澧县、石首、监利均有公路。

扼鄂中水路、陆路之要冲”，更加沙市四周城镇均较富裕，素为物资集散之地，经济条件较好，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部的驻地，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

为什么我会被蒋介石重新起用，去当这个“党政处长”呢？1934年夏，正是第五次“围剿”行将得手之时，他看到在湘鄂西单纯依靠军事不可能战胜红军，必须搬用在江西所曾采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套套，才能收“剿除”红军之效，遂决定在高级司令部内设立“党政处”，贯彻“战略进攻，战术防守”的精神，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指挥作战。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调到徐源泉总部的。

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对湖北籍将领素无好感，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历史渊源由来已久。他历来以黄埔校长这块牌子笼络学生为其个人效劳，但有些黄埔学生却不听这一套，等而下之的如湖北的金亦吾、吴兴泗等，立山头，拉队伍，生活糜烂，大搞“三金、五皮”（三金系指金戒指、金手表，镶金牙；五皮系指皮靴、皮包、皮带、皮鞭、皮马鞍），社会观感很坏，有“黄虫”（蝗虫与黄虫同音，影射金亦吾等）之谓。蒋介石深恶痛绝，处治了这些人，并批示

“永不录用”。我在黄埔生中，虽不属于这一类型，但蒋介石也是很很不满意的。因为大革命时期，武汉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反蒋委员会”，对蒋违犯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政策抨击最力，我是该会武昌区负责人，后来被蒋查知，开除了我的国民党籍，又被悬赏5000银元通缉。我到上海后，又和几个同学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向全国发通电，骂蒋是新军阀。他暴跳如雷，串通巡捕房把我们关了一段时间。几年以来，我没再给他添麻烦，他可能认为我回心转意了，加上要在四省边区搞什么“特区”，需要找一个适当的人选，这是因为：1.可能我是黄埔一期生，在部队中关系较为广泛，又是湖北人，生于斯，长于斯，这次作战依托主要在湖北，人地相宜，可资熟手；2.我与作战双方主将，或者有旧，或者可以拉上关系。对贺龙而言，过去有些交往，情况熟悉；对徐源泉而言，以黄冈小同乡身份，便于融洽关系，开展工作，还可以就便掌握徐部官兵思想、士气、军纪、作战情况，随时上报。我的这些条件，蒋介石当然“胸中有数”。找来找去，这个差事就找到了我的头上。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北伐时说起。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部队在武汉整编，那时我正由苏

联学习回国，奉派为第11军教导营长，专门训练学兵。贺老总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因工作关系，时有交往。贺龙那个军刚成立不久，需要大量下级干部，就要我为他培训学生。我专门是搞训练工作的，条件较好，就帮他训练了一批学生，毕业后都调到他那里去了。教导营的学生毕业后，我被调到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校参谋，那时张发奎是总指挥，贺龙也受张的指挥，每逢周末总部召开汇报会，贺龙和我经常参加，所以接谈的机会更多些。有一次，他要我到他的军部当训练班主任。因事，辞未就任。

我这个“黄埔系”军人，被派到徐源泉这个非嫡系部队里，虽然徐及其他将领表面上对我礼遇、亲热，骨子里却有所戒备，惟恐我向蒋介石打“小报告”，对他们不利，因而有些事背讳我。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也有所觉察，于是，“瓜田李下，各避嫌疑”。不过，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交往增多，顾虑减少，从茶余饭后，酒酣耳热之际，也了解到一些事情，现就记忆比较清楚的几件事分叙如下。

巩固后方 军政矛盾

在第一次“围剿”中，徐源泉的部队虽然将

湘鄂西根据地攻下，但红军主力基本保存，只不过是组织的大规模抵抗停止而已，实际上环湖地区之农村、乡镇并不能切实控制，红军游击部队时有活动。武汉行营有鉴于此，曾令徐源泉加强地方“自卫”能力，严密保甲组织，进行“政治清剿”，肃清“散匪”，巩固后方。徐接令后，除命有关专、县切实执行外，并将当时在江、监、潜边三湖、四湖、白鹭湖拥有众多党羽的帮会头目郑华堂及其团伙悉数捕杀，外界多以为是因郑庇运烟土，与国民党嫡系的沙市禁烟督察处长钱伟声发生利害冲突。互控结果，钱因证据确凿被处决，其弟钱大钧（蒋的亲信，行营参谋长）为了报复，对徐施加压力所致。这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这是一次为了巩固后方，借题发挥的“政治清剿”而已。由于郑华堂“兄弟”伙甚多，散处江、监、潜边湖区，聚则为匪，散则打鱼、种田，根深蒂固，殊难清除。徐源泉奉令后，经过周密部署，采取了“欲擒先纵，诱蛇出洞”办法，先招安郑华堂为48师团长，旋又升副旅长，声势显赫，徒众招摇过世，得意忘形。再通过郑封官许财，把这些人招集拢来，然后连人带枪，一网打尽。此辈打家劫舍的多，真正农民、渔民甚少，分散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则很少上钩。

的。

军政矛盾也间接地造成了国民党后方的动荡不安。前面说过，徐源泉与当时在荆州的专员雷啸岑关系比较紧张。前者重兵在握，权倾一方；后者背景坚挺，来头甚大，是以积不相容，各捏“痛脚”，伺机而动。恰好1935年入夏以来，江汉平原各县，阴雨连绵，引起山洪暴发，沮漳河水猛涨，加上荆江河段水位日升，堤坊年久失修，7月13日万城溃口，近邻各县顿成泽国；农田被淹数百万亩，哀鸿遍野，荆沙亦被洪水包围。省政府及水利部追查责任，荆江堤工局长徐国瑞眼看大事不好，便向徐源泉作秦庭之哭，徐及其左右亲信心领神会，便出面为堤工局撑腰，指责汛情紧急时行政当局（当时雷啸岑兼江陵县长）没调民伕，措发防汛抢险器材，来对雷施加压力，同时又发动地方士绅攻讦雷啸岑在五月间损失了荆州南门内息壤庙内治水神物“蟋蟀”。雷亦不甘示弱，撰文“荆州洪水围城记”，在上海《时事新闻》发表，反击徐源泉对他进行武力威胁，徐部秘书皮震则在《扫荡日报》、《武汉日报》发表“驳洪水围城记”。双方互向省政府、行营、行政院、军委会控告，散发“水灾专集”，推卸责任，攻击对方。弄得舆论哗然，皂白难分。

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以收买了笔杆子的枪杆子战胜了处于相对劣势的笔杆子。雷啸岑见势不妙，乃化装潜逃。事后，行政院，以“另有任用”的一纸空文，了此一桩公案。从表面看，此事好象与“围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则双方内耗甚巨。徐源泉为打官司专门成立了“写作班子”，并将特务团从前线调回，对雷进行威胁。雷啸岑几月不理政务，奔走沙汉、宁沪之间，搜集徐“谎报军情、武装走私、包庇烟土”证据，至于灾后孑遗之救抚，田园之整修均视同无睹，因而粮食严重减收，民不聊生，增加了社会的动荡。

此外，蒋介石为配合其军事进攻，还发动了一个“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即所谓“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始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之际。国民党的部队虽然占领了苏区许多地方，但这些“收复区”的治安始终动荡不安，蒋介石认为非单纯军事力量所能征服，必须“提倡礼义廉耻”，对“人心加以改革”。因而在南昌成立了由蒋介石自兼会长的“新生活运动总会”，作为“改革人心”的重要机构。总会之下，各省市县均设立支会、分会。沙市分会，由徐源泉任名誉会长，总部参谋处长黄道崇任总干事。为贯彻上述